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编

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

开县卷

中共重庆历史开县卷编纂委员会 著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编

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

开县卷

中共重庆历史开县卷编纂委员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开县卷 /中共重庆市开县卷编纂委员会著.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9-04971-3

I. 中… II. 开… III.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史—开县 IV. ①D235.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2012)第 027795
号

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开县卷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ONGQING LI
SHI · KAIXIAN JUAN

中共重庆历史开县卷编纂委员会 著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别必亮 王晓静

责任校对:李小君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40mm×1030mm 1/16 印张:23 字数:310千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4971-3

定价: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开县是渝东北一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人才辈出的山区大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刘伯承的故乡。《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开县卷》，记述中共开县组织在这块土地上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80 年历程。

中共开县组织的建立，绝不是偶然的。自从开县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以来，开县人民即从经济社会日益深刻的变化和所遭受的日益深重的灾难中，逐渐觉醒并逐步融入社会变革的大潮。“公车上书”中的六举子，红灯教起义中的无畏农民，辛亥革命中的仁人志士，他们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开县人，在历史发展的一个个节点上，有着非凡的表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所作出的努力甚至牺牲，未能改变人民的苦难命运。开县人民还得艰难地求索，直至找到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共开县组织，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导者，开县的革命斗争才真正走上虽然艰难曲折但必定胜利的道路。

1927~1949 年的 23 年，中共开县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人民群众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终于在即将迎来刘邓大军之际，实现开县的和平解放。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长期的白色恐怖中，尤其是在开县党

组织两次遭到大破坏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志士置生死于度外,沉着应对,英勇奋斗。即使不幸被捕,在严刑拷打、百般利诱面前,坚贞不屈,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开县人民的翻身解放,是包括他们在内的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从开县解放到 1978 年的 29 年,中共开县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卓有成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解放初期,以很短的时间收拾旧社会留下的烂摊子,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人民迅速过上当家作主、安居乐业的日子。之后,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开县初步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长足进步,使开县面貌与 29 年前已有天渊之别。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也发生过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失误和挫折,但都在党的领导下纠正和扭转。体味探索的艰辛,总结失误的教训,对于纠正错误、战胜困难,弥足珍贵;对于酝酿和迎接重大突破,更是一种特殊的准备。事实已经证明,历史的挫折,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县党组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扎实推进改革开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紧抓住三峡工程建设、重庆直辖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新县城等城镇建设的突飞猛进,加上 40 万农民外出务工、回乡创业,更加促进开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开县改革开放的 28 年,是开县人民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奋斗成果丰硕的 28 年,是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城乡面貌大为改观、人民生活大为改善的 28 年。

中国共产党在开县的历史,是党的全部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党的历史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历史智慧和表现为优良传统的历史文化。开县党组织走过的 80 年曲折艰辛的历程表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保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的全部工作包括党自

前 言

身的组织、思想、作风和制度建设，都紧紧围绕为人民群众谋福利这个根本宗旨，是实现开县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困走向富裕的力量源泉；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切实尊重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从开县的实际出发，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坚定地、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开县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前提。

本书是在县委的领导和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经过 6 年努力编写而成的。我们在编写工作中，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遵循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精神，尽力做到全面、准确、系统地记述党带领开县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尽力反映开县党组织活动的特点即开县地方党史的特色。本书当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中共开县组织的建立及其早期活动	1
第一节 中共开县早期组织的创立	2
第二节 在国共合作中壮大革命力量	9
第三节 中共开县中心县委领导的农民运动	13
第四节 红军在开县的活动及其影响	20
第二章 党组织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中稳步发展	25
第一节 中共开县县委的建立与抗日救亡运动	25
第二节 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及斗争策略的转变	34
第三章 前仆后继,和平解放开县	41
第一节 中共开县组织的恢复与建立	41
第二节 中共开县工委成立前后的顽强斗争	46
第三节 川东游击纵队在开县的战斗	54
第四节 和平解放开县	59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	67
第一节 中共开县县委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67

第二节 征粮剿匪、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	73
第三节 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造	80
第四节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88
第五节 整顿发展党的组织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94
第五章 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	101
第一节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01
第二节 “一五”计划的实施与成就	116
第三节 民主政治建设与党的建设	121
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29
第一节 学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开展整风运动	129
第二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35
第三节 国民经济调整和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	151
第四节 十年建设成就	163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66
第一节 党组织的瘫痪与县革委的建立	166
第二节 制止武斗与初步落实干部政策	175
第三节 斗、批、改与党组织的恢复	179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曲折演变与终结	186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开县经济	192
第八章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96
第一节 开展揭、批、查运动	196
第二节 经济和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200
第三节 农业学大寨	204

目 录

第九章 拨乱反正与改革起步	210
第一节 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束缚	210
第二节 平反冤假错案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215
第三节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220
第四节 经济调整与改革起步	224
第十章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235
第一节 深化改革,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235
第二节 国营企业及相关领域的改革	248
第三节 精神文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	258
第四节 加强党的建设和贯彻干部“四化”方针	268
第十一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74
第一节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274
第二节 继续推进农村改革	284
第三节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290
第四节 三峡水库开县库区移民	298
第五节 政治建设与文教卫生事业的新进展	302
第六节 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建设	311
第十二章 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17
第一节 移民攻坚与新县城建设	317
第二节 二、三产业的发展	324
第三节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326
第四节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开县	332
第五节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全面提高执政能力	340
后记	352

第一章

中共开县组织的建立及其早期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共开县地方组织的建立,是这一历史必然性在开县的具体体现。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重庆、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相继开埠以后,南邻万县的开县,即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袭、渗透下,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开县人民从经济社会日益深刻的变化和所遭受的日益深重的灾难中,逐渐觉醒并逐步融入社会变革的大潮,最终由一批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和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建立中共开县组织。中共开县组织成立伊始,即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并经受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严峻考验。

第一节 中共开县早期组织的创立

一、近代以来开县的经济社会状况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 1891 年(清光绪十七年)和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重庆、万县相继开埠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袭、渗透、扩展到包括开县在内的下川东。首先是洋纱洋布溯长江而上进入开县市场,促使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解体。而西方资本对开县蚕丝、桐油等原料的掠夺,则引起开县经济的进一步变化。

蚕丝是西方资本重点掠夺的优质原料之一,蚕桑生产在出口需求的刺激下发展起来。1889 年(清光绪十五年),县城附近即有祁家丝厂、李家丝厂、亚东丝厂投产,临江、南门也出现小丝厂。20 世纪初,开县种桑近 9000 亩。开县是桐油主产区,清末即销欧美,后经发展,在 1920 ~ 1931 年间,常年产油 150 万 ~ 250 万公斤。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连同其他一些条件,促进了手工作坊尤其是粮油加工作坊的发展。其中一些虽无近代机器生产,但资本较大、雇人较多、劳动协作要求较高的作坊,在农村已成为富农经济的重要构成,在城镇和煤、盐等矿区,已成为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效率较高的经济实体。但是,大多数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还只是作为农业内部的分工分业或小手工业户而存在。

事实上,农民是在苛捐杂税、高租重押和高利贷的压榨下,被迫从多种经营和家庭工副业上去求生路的。他们从出口刺激等市场信号上,看到这比种粮合算,其结果却是大多数人反而陷入更加饥饿贫困的境地。大量种植鸦片(罂粟),是商品经济畸形发展的突出表现。西方列强用鸦片和炮舰打开国门后,清政府对鸦片的种、运、贩、吸采

取纵容态度。19世纪50年代后,鸦片的种植面积超过任何一种经济作物。清末长江上游的鸦片产地主要集中在川东,而开县的鸦片年产为2790担,仅次于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列15个主产州县的第二位。到20世纪20年代,年产达25万多公斤。其售价也一路上涨至每两两块银元,由此换回的银元,因土地租高押重,主要流向土地购置,引起土地进一步集中和地价进一步上涨,这一切都得由农民来承担。更为严重的是,烟毒摧残着人们的身体和精神,从根本上破坏生产力,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可估量。除了毒品,一般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又如何呢?1932年日本丝绸倾销,导致茧价猛跌,开县蚕农的损失十分惨重,丝厂全部倒闭。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农民的命运被市场控制,而市场是被外国资本垄断的。尽管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民族资本也开始出现,但外国资本从中掠夺,封建剥削日益繁苛,古老的、分散的手工生产几乎原封未动,反而导致经济日渐衰萎,民生更加困苦,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川江轮船通航以后,开县与沿江县份尤其是与万县比较,交通闭塞的问题更加突出,摆脱困境也要费更多力气。在这种情况下,开县人民尤其是他们中的热血青年、有志之士,不得不为寻求一条生路而艰难地求索,奋力地苦斗。

在开县,最先警醒并融入全国社会变革大潮的,是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参与“公车上书”^①的六举子。开县在“公车上书”的签名人数,几占全川的十分之一,仅次于成都府的成都、华阳两县,开县从此被称为“举子之乡”。由“公车上书”开始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而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派,毕竟是新兴的政治力量。它提出的政治主张虽然在中国行不通,但在当时确实振聋发聩。开县举人杨绍云、欧阳薰、戴锡章、刘秉元、邓云卿和李可均参与“公车上

^① “公车上书”:1895年4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派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反对。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汉代举孝廉乘公车赴京,后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书”,在封闭、保守、沉闷的开县思想界,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不少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从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革故鼎新的尝试中得到启发,受到鼓舞,从此吹起一股创办新学、追求新知、探索新路的新风,为开县后来的发展与变革,作了思想文化上的最初铺垫。戊戌变法以后,不少青年学生投考重庆、成都、武昌、上海、北京等地的各级学堂,并且极力争取出国留学。廪生刘华英,经商时在重庆、汉口、上海之间往返,受到西方文化和改良主义思潮影响,认同教育救国,于1904年自筹资金在灯草坝(今敦好镇)创办“汉西书院”,开设新学课程。时年12岁的刘伯承,在该校开始接触数学、理化、地理等科学知识。1905年开县改县城西郊培俊堂为中西学堂,1906年开办开县高等小学堂(时称县高),接着在全县各地兴办近20所小学。县高首次招生300名,刘伯承以优异成绩考入,并在刘华英资助下入学。该校教师大多水平较高,傅让、朱璜等人毕业于日本弘文师范学校,思想进步,是同盟会员。他们秘密将一些进步杂志和革命书籍在学生中传阅,如《鹃声》、《四川》等杂志,《革命军》、《天演论》等著作。刘伯承和同窗好友阅读这些书刊,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认识到清廷的腐败没落和变革的必要。

1907年春,开县浦里一带爆发红灯教起义。红灯教主张的洋人洋教是一切祸患的根源的观点,深得劳苦大众拥护。1907年农历4月,李文华、谭汝霖、韩洪顺、余师傅等人,以“反清灭洋”、“打尽三堂”(天主堂、福音堂、教会办的洋学堂)为号召,领导跳蹬、岳溪、五通、善字、龙安(今属岳溪镇)一带数千人教农民起义。他们捣毁“三堂”,抄没洋教神职人员和入教富绅的家产,惩办为非作歹的教徒。开县知县侯同初调兵遣将前去镇压,并亲自督阵。4月28日在陈家乡(今属长沙镇)三宝庵一战,被红灯教义军打得大败而逃,随行的湖南同乡邵师爷被当场打死。德国牧师吴本馥闻讯,半夜从县城逃走,躲过这场风暴。之后,侯同初主持祭奠邵师爷,刘伯承与邹靓澄、谢南城闻讯赶到,各写一副令当局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讥讽挽联至灵

堂。刘伯承写的是：“战马长嘶浦河岸上湘楚壮士八面威风，昏鸦悲啼凤凰山下洞庭孤魂四季寂寞。呜呼哀哉。”5月，红灯教起义在四川总督赵尔丰派来的数千清军的残酷镇压下失败。接着，西方列强支持下的传教士强索赔款三万两，赵尔丰令地方官就地筹款，开县人民饱受其害。

1911年10月16日武昌起义后，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开县籍同盟会员谭毅武，回县带领一部分革命同志劝说知县陈山铭反正。与此同时，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开县籍同盟会员潘大道，与万县的同盟会员熊晔在万县策动防军，促使巡防营管带刘汉卿于11月25日反正。在这种情况下，开县秀才李棻说服知县陈山铭交出县印，宣布开县反正。风云骤变、激烈动荡的1911年，不仅为革命党人提供舞台，同时也让一些处在社会底层的热血青年看到希望。刘伯承从1907年父亲病故后便辍学回家，干农活，挑煤炭，打短工，什么重活、累活都干，日子却越来越艰难。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理想、抱负，与现存制度格格不入；民众的利益与上层统治集团的巧取豪夺水火不容。而当时孙中山领导的接连不断的反清武装起义，震撼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1911年底，19岁的刘伯承以“仗剑拯民于水火”的气概，赴万参加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就这样，青年时代的刘伯承，怀着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改革的思想，投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

1912年（民国元年），开县同盟会员公开活动，随着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掌握了开县政府。1913年7月爆发“二次革命”，开县为熊克武讨伐袁世凯提供粮饷。9月，讨袁失败，国民党县党部被取缔，开县的政权落入效忠袁世凯的共和党之手。从1912~1934年的23年间，开县的知事、县长共34任，每任平均只有八个月零几天的任期，由此可见斗争之激烈和政局之动荡。1919年因军阀混战，军费猛增，当年的正、副税入不敷出，便“借垫”、“预征”。这一年，筹垫军饷11万银元。接着全川江防第三纵队司令谭遵武两次令

开县筹借饷银 5 万元。以后年复一年预征,到 1934 年,开县田赋已预征到 1948 年。开县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积贫积弱的颓势日甚一日,亟待新的力量来扭转。

二、马克思主义在开县的传播与中共开县早期组织的创立

五四运动以后,尤其是大革命时期,开县到重庆、成都、武昌、上海及广州等地读书或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的积极赴法勤工俭学,有的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中受到鼓舞,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与家乡声气相通,使开县的一些热血青年、有识之士,了解到外面的革命形势,逐步懂得一些革命道理。

五四运动中,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作为主力军的伟大力量,“劳工神圣”成为他们新的认识。一些渴望出国学习报国本领、探求救国真理的青年学生,更加认同勤工俭学。当时他们大多把目光投向法国,因为法国曾是欧洲革命的中心,其经济社会状况在欧洲具有代表性,同时又缺乏劳动力,由此形成赴法勤工俭学热潮。在法国,无论是学自然科学还是学社会人文科学的中国学生,都直接地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多数学生还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使他们中不少人的思想感情发生根本性变化,并由此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1919年初至 1920 年底,全国 1600 多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四川 378 人,为全国之冠。这一时期,下川东共有 12 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1920 年 12 月 15 日,开县的吴从龙、朱锡恩、杨明镜、唐运鸿从成都等地齐集上海,与巫山的李季达(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任天津地委书记,1927 年被捕牺牲)等 94 人一道,乘“智利”号轮赴法国。之

后,开县赴法留学较有影响的是徐平^①,对1934年建立中共开县中心县委起过作用。

1925年,在重庆读书的彭子如、谢伯雍(谢盛镐)等开县革命青年,带回《新青年》、《共产主义的A、B、C》等书刊,开始播下革命的种子。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半年,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阅读《唯物史观》、《社会问题讨论集》、《向导》、《中国青年》和一些有关阶级斗争学说的书籍和报刊。马克思主义在开县的传播,为创建中共开县早期地方组织,打下了思想基础。

彭子如1925年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7月左右,经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锡俦介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9月,杨闇公派彭子如回开县发展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此前,彭子如已受中共重庆地委指派参加国民党工作,于是杨闇公直接参与其领导的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同时委派彭子如和谢伯雍(共青团员)回开县筹建国民党县党部。临行前,杨指示彭:目前正是万县“九五惨案”之后,下川东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有深切的仇恨,要发动和组织群众,扩大革命影响,做好配合北伐战争的具体工作。当时开县是军阀杨森的防区,杨森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关系很深。慑于北伐的声势,虽然收起“四川陆军”的旗帜,但并未把“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打出来,其在开县驻军头目还扬言禁止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彭子如到紫水小学代课,利用机会宣传革命,唤醒群众,并提出“团结青年,学习政治,赞助革命”的政治主张。10月底,他联络麻柳坝(今麻柳乡)的丁月槎、高升

^① 徐平,开县南门镇人,1921年考入武昌高师,1923年“二七惨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1929年在法国、苏联留学,在法曾任中共旅法支部(后为法共中国部)书记。1930年回国后曾在中央机关工作。1934年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赴成都,恢复重建四川省委的组织,并检查督促其贯彻执行中央路线。到川两个多月中,将省委和重庆、万县、泸州、嘉定(今四川乐山)、三台等中心县委恢复、建立起来。同时认定,四川党的工作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罗明路线”下的取消主义,督促省委开展反对“四川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是年8月被捕,接受劝降条件,写了脱党宣言,11月底叛党出狱后,曾在特务机关任职、任教。

场(今高桥镇)的向君鉴、紫水坝(今紫水乡)的尹邦锡(尹辉九)等,在紫水小学成立“开县青年自治会”。虽然该会的成员比较复杂,存在时间也不长,但却是共产党员在开县建立的第一个群众组织,为以后建立党团小组做了一次尝试。

彭子如回开县后,与谢伯雍一道,分别吸收王雨公、张仲屏(张兆藩)、肖瑞卿(女)、许寅宾、彭子寿(彭雅萝,女)等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为共青团员。不久,彭子如又将共青团员张仲屏、谢伯雍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初,连同万县党组织派到开县的党团员共10多名,在县城建立党团小组^①,彭子如任组长,直接受中共重庆地委领导。该党团小组一般是每周星期日在彭子如家集中,学习或研究工作。1926年冬至1927年春,中共重庆地委候补委员李嘉仲,派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万县省四师)学生、共产党员陈延芳(重庆巴县人),到开县临江发展组织,建立了党团小组^②,其成员有涂逵、金本生、雷乐鉴、肖怀川、冉文钦(女)、谭永贞(女)等,陈延芳任组长,直接受中共重庆地委领导。该党团小组通过平民夜校、励志学会、临江刷社等进行宣传,扩大影响,演出过《齐家难》、《烂团总》、《孔雀东南飞》等剧目。1927年参加筹建国民党临江区分部,1928年夏开展反对临江团总雷如九的斗争。这两个党团小组在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十分注意通过革命理论的学习与宣传,来提高自己并扩大影响。

这一时期,已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身为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三成员之一的刘伯承,对引导开县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到重要作用。这些青年,有的参加了泸(州)顺(顺庆,今南充)起义,有的被引介到黄埔军校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回开县从事革命活动。

^① 见中共四川省万县地委组织部、地委党史研究室、地区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四川省万县地区组织史资料(1923~1987)》,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13~14页。

^② 见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1921~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42页。